

茅盾小说论

王嘉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乐秀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茅盾小说论

王嘉良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浙江嵊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40,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0477-X/I·397 定价：4.20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研究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方面的情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本社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还包括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坚持贯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同一研究题目，如果有见解不同的著作，只要立论明确、言之成理，我们愿意重复出版，以利学术讨论。

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不包括资料部分，有关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将由本社分别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次

小引	1
第一章 史诗描述：中、长篇小说的社会编年史特征	3
一 史诗，从现代史的源头——“五四”开始	4
二 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性探索	11
三 刻绘“立体式”的社会结构图	17
四 叙写“大时代”的宏伟诗篇	24
五 结论：杰出的社会编年史作家	33
第二章 作为史诗“续篇”的短篇小说创作	35
一 概括得广——从时代生活的宽处着眼	36
二 开掘得深——在生活的“内部本质”中探求	42
三 解剖得细——向人物心灵的深处突进	47
四 驾驭宏阔生活的艺术独创性	53
第三章 史诗的片断：对现实的历史透视	69
一 构筑从历史通向现实的桥梁	70
二 寻求独特的历史发现	74
三 写出个性化的历史“活人”	79
四 目的是创造一件艺术品	82
第四章 形象观照：形象系列(一)——“时代女性”系列	87

一	“时代女性”的三型·····	87
	软弱型、刚毅型、特异性·····	89
二	女性形象的独特创造·····	102
	色彩浓重的时代性特征·····	103
	含蕴深广的社会化价值·····	110
	性格独异的典型性形象·····	115
第五章	形象观照：形象系列(二)——民族资本家 系列·····	120
一	在《子夜》的延长线上·····	121
二	“命运注定了要背十字架”·····	126
三	形象系列的历史纵深感·····	133
四	类型本质的两重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141
第六章	形象观照：农民形象，作为探索“农民问 题”的一个视点·····	149
一	着眼于“大中国的人生”看待农民世界·····	150
二	在“时代视野”中观照农民生活·····	157
三	刻印着时代特质的农民典型·····	162
四	描绘农村生活的成功经验·····	167
第七章	小说品类：社会剖析小说的典型模式·····	172
一	整体性的社会人生研究·····	173
二	社会剖析的浓重理性化·····	180
三	独特的思维方式：两种思维的渗透和交融·····	187
四	独特的创作个性：文学家和哲学家的结合·····	197
第八章	创作理性化——自觉的艺术思维活动·····	205
一	“做小说”——艺术构思中的惨淡经营·····	205
二	理性化观照下的思维自觉性·····	210
三	侧重再现的“立体思维”结构·····	215

四	“立体思维”的重要环节：把形象化纳入构思·····	223
五	艺术思维的开阔性和活跃性·····	230
第九章	注重形象创造的现实主义小说特质·····	236
一	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主体性的创作追求·····	237
二	在人物性格化的展示阶段上·····	242
三	人物性格典型性的深层开掘·····	251
四	走向性格塑造的更高审美层次·····	258
第十章	追求有机性结构形态的小说叙事模式·····	270
一	“有机性”——小说叙事结构的总体原则·····	272
二	重于理性分析的“立主脑”叙事结构·····	279
三	以性格为中心的叙事结构·····	285
四	情节的“连锁性”组合·····	292
五	结构的“整体美”追求·····	298
结束语	茅盾作为小说家的历史地位·····	304
后记	·····	321

小 引

在目前文学观念不断更新之时，研究茅盾小说也许是颇不合时宜的。因为时下不少人们感兴趣的是那些探究人生永恒奥秘的“纯”文学作品，而对于注重社会功利性，强调作家使命感的创作则往往评价偏低。茅盾的小说属于后者，时或遭到冷落，自难幸免。这也无怪。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用单一的社会学模式评估几乎是全部文学创作，致使别有价值的那部分文学精萃也扫数归入“不合格”之列。于是，当文学观念变更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悖论”，对体现了“社会化”的创作都给予了苛评，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在这个并不讨巧的研究领域里，我竟傻乎乎地干了七、八年之久。新观念的撞击，常常使我感奋，也陷于困惑，以致不时怀疑自己的研究路子是否对头。然而，当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茅盾作品时，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熟练地驾驭小说艺术规律的精彩篇章竟会位居那些被尊之为“纯”文学的作品之下——姑遑论它还有别一种社会价值在。犹疑也是一种思索，而思索的结果是增加了乐此不疲的信心。在我看来，称之为“文学”的这个词儿，对它的解释原就没有一定之规，不能说某一种解释具有绝对的真理性，据此即可对不同的文学样式作出同一的价值判断。像茅盾这样注重客观写实、注重创作功利性的作家，在中外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为何就不可以作出应有的估价呢？出于对文学涵义的不同理解，作家笔下的作品可以有多种模式。过去对非理性、非社会化的创作重视不够，确是一种失误，然而也没有必要据此贬抑非属同调的创作。更

何况，茅盾的小说在艺术社会学的层面上该属于较高品格的一种，至少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同一品种里茅盾的大多数作品是高出一筹的。如此，对这位富有独特个性的作家的小说创作作必要的研究，借以透视和总结它所代表的那个小说品种的基本特质，就不会是毫无价值的。

我写这本小书的基本构想，是力图勾勒茅盾小说的全貌，在此基础上梳理、归纳此种别具特色的小说的基本特征和创作经验。前三章着眼于小说的史诗描述，从不同体裁、不同题材的作品中揭示一以贯之的史诗性特征，这既是对小说内容的全景描述，也想借此显现小说容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中间三章是形象论。现实主义小说注重创造形象，特别是典型现象，作家的创作思想也多半寄寓在形象中，论及小说的思想蕴含自不可不注意于此。后四章是茅盾小说的基本特质归纳，想从社会剖析小说模式、理性化创作思维特征、“以人为本”的形象创造理论和实践、小说叙事结构等诸方面作些理论上的分析与探讨，勾划此类小说的基本形态特征。这里曾是我用力较多之处。然而毕竟限于功力，立意虽高而终难尽人意，这倒是感到十分悲哀的。

第一章 史诗描述：中、长篇小说的 社会编年史特征

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作家，往往就是一代社会历史的忠实证人。历史循着自己的发展轨迹行进，作为社会“书记官”的作家则努力捕捉它在前行过程中“深刻而经久的特征”，于是，文学也就成了或一时代的“历史的摘要”。①巴尔扎克说：“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我常常用这样一句话说明我的计划：‘一代就是四五千个突出的人物扮演一出戏’。这出戏就是我的著作”②。这位作家的夫子自道曾为恩格斯所首肯。他指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8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③由此看来，“用编年史的方式”去写出一代社会历史，是有例可证的，巴尔扎克确乎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一个伟大的创造。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最接近于那些产生了史诗型巨著的伟

① 泰纳：《艺术哲学》第3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 《致〈星期日报〉编辑保利特·卡斯特叶先生书》，《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2期。

③ 《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大作家，是茅盾。八部长篇、五部中篇、五十多个短篇——几百万言的煌煌巨著，正记录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业绩。然而，最足以说明茅盾创作的史诗特点的，还不仅在此。从“使文学成为社会化”^①的要求出发，茅盾所追求的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目标，力图展现的同样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他不像一般作家那样只从一个相对集中的角度去开拓生活（如有的侧重描写农民，有的主要表现知识分子，有的则擅长反映市民阶层等等），而是把艺术的笔触伸展得相当广阔、辽远：描写的对象涉及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牵涉的生活内容有关政治、经济、教育、战争、革命、反革命等各个方面，反映的历史又几乎囊括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现代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而且也几乎是“逐年地”烙下了时代生活的印痕。只要把茅盾的全部中、长篇小说联贯起来作一番综合考察，就不难发现它的巨大的历史内容是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的。因此，茅盾无疑也是一个堪称为写出了一代历史的作家，他的作品就是一部宏伟的现代中国社会的“编年史”。就这一点而言，茅盾得以进入世界优秀作家之列而毫无愧色。

这里，着重探讨茅盾小说的“编年史”特点。由于着眼点是作品内容反映社会生活的“编年”性，这就不得不打乱作家的创作时序，从作品所描写的时代生活的前后勾连中去探寻一条昭示着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线索。

一 史诗，从现代史的源头——“五四”开始

茅盾小说所展现的历史画面，如果从“编年史”的角度去理解，始于“五四”时期，即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掀开了光

^①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第17卷第1期。

辉的一页以后。《虹》和《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两部长篇，就录下了由“五四”伸展开去的一个较长时期的时代生活图画。这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不折不扣的起点，由此显示出茅盾的创作内容同中国现代历史同步发展的趋向。

把艺术的表现范围匡定在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期，而不是像鲁迅那样把笔墨延伸到辛亥革命以前，去描写“老中国的儿女”，这是基于茅盾对文学的独特要求。大而言之，“文艺的时代性”和“文艺的社会化”，以及由此而规定的“现代中国人生”的描写^①，是茅盾既定的不可变更的创作原则。因此，当他力图表现整个“现代”人生的时候，创作从“现代”的源头——“五四”落笔，也就毫不足怪了。茅盾写于同创作《虹》同一时间的《读〈倪焕之〉》一文，反复申述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认为没有了“五四”，未必会有“五卅”，也未必会有大革命，“历史是这样命定了的”。他又慨叹于“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然而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出来”，即使“最有惊人色彩”的鲁迅的小说，“在攻击传统思想这一点上，不能不说是表现了‘五四’的精神，然而并没反映出‘五四’当时及以后的刻刻在转变着的人心”。这几乎可以看成是茅盾写作《虹》一类小说的直接动因。正是“五四”的“划时代”意义和文学“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切迫性，驱使他把一代历史画卷的第一笔落在“五四”上。这样，由《虹》开头的“从赵家楼的一缕火光”所烛照的新的时代生活，便构成了茅盾创作的基调；他的社会“编年史”也从一开始就触及了时代的、历史的本质。

《虹》所展现的“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种种情状，是有

① 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第20期。

相当典型性的。同茅盾以往小说的背景一般不出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会或杭(州)嘉(兴)湖(州)一带的乡村、城镇不同,《虹》所选择的社会环境却在“西陲的‘谜之国’”的四川,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作者写这部小说时尚未到过四川,小说开首梅女士出川时三峡险峻风光的一段描写,也还是在同人闲聊中,“凭详细之耳食再加以想象”^①而成的。然而,这并非作者故意追险猎奇,而是对典型环境的精心选择。像小说所描写的成都、泸州一类的“闭陋梗塞的地界”,无异是古老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从巴金的《家》里领略过这样的氛围,即便在“五四”浪潮的冲击下,那里封建势力的猖獗仍然是触目惊心的。先于《家》近三年写成的《虹》,选择的背景同《家》不期然相同,明显见出了作家的识见。浓重的封建气息,亟待改造的社会环境,正为新旧两种势力的对垒提供了有声有色的舞台。尽管“五四”怒潮在一个月以后也卷到了“西陲”成都,学生走上了街头,少城公园召开了抵制劣货大会,但最初的冲击力也不过是掀起了一阵死水微澜。单看剪发以后的梅女士走到街上,便有一群“像卫队似的”人围着看热闹,就足见扫荡旧势力之艰难了。因此,追求自由的梅女士,屈从父亲的压力,为他“卸清了积年的债务”,而把自己“卖”给商人柳遇春,走进了一个市侩气息极浓的“柳条笼”,也正是当时所不可避免的。这实际上预示出,她此后要争得一条解放的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作出艰辛的努力。果然,当她鼓起勇气冲出了“柳条笼”后,投入的却是另一个更大的“柳条笼”。在治本公学特别是在泸州师范,她见到的是一样庸俗不堪的人物,满嘴的“新文化”、“新政”等美丽名词掩盖不住他们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尤其是那个觊觎她貌美的惠师长,更使她时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时陷在慌乱之中。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表现了青年一代斗争的艰巨性。当然，规模空前的五四运动对古老的中国社会毕竟是一阵剧烈的震荡，新思潮源源不断的冲击更不是任何封建堤坝所能阻挡的。既然梅女士一类青年已为“五四”的一幕所震醒，此后在新思潮的不绝如缕的灌输下，她（他）们就决不可能安于永远被宰割的命运。小说写梅女士在新思潮的导引下，为外面的“新奇”世界所鼓舞，采取了不顾一切的反抗，终于左冲右突，闯出樊门，来到上海，投身到集体主义的洪流中，为自己争取到了光明和幸福之路。梅女士的觉醒，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觉醒：个人的命运联系着时代，人们的觉醒又同时代的主潮密切相关——这正是对“五四”时代精神的本质的把握。而这种觉醒，又是在一个时代浪潮不易冲击到的边陲地区呈现出来的，它所展开的背景本身就烙有古老社会的印记。这就不但显示了“五四”新思潮的冲击力之大，而且在整个中国古老社会的范围内（不只是新文明最易波及的沿海大都会）表现了一个时代的脉动，小说也就具备了更大的认识一段中国社会历史的价值。

自然，就社会发展的大致轮廓来说，一场伟大的运动可以改变一代人的命运，这原是不错的，但实际生活却要远为复杂。时代的冲击力不是一种均衡的张力，它在人们身上所起的作用是曲折微妙的。这就显出了茅盾所强调的要表现“五四”以后“刻刻在转变着的人心”的重要。《虹》描写梅女士的性格有一个发展过程，细致入微地演示了人物思想演变的轨迹，几乎展示了一代人在“五四”潮流影响下走向革命的曲折历程，从又一个方面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小说写梅女士在“新”字号排行的“惹眼的杂志”面前如醉如痴的倾倒，可说是对一代青年人在突如其来的新潮流面前思索、渴望、追求的最真切的心灵写照。最初，她对新思潮是不加分辨，一体接受

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各式各样互相冲突的思想，往往同见于一本杂志，同样被热心鼓吹”，她都感到新鲜，都会为此而陶醉。用这样芜杂的思想武器去向旧势力抗争，很快就表现出它的脆弱性。她曾经热恋过的、软弱的韦玉不思抗争而导致悲剧性的死亡，证明了他所信奉的“托尔斯泰哲学”的破产；她的挚友徐绮君空谈“易卜生主义”，也不曾为自己争得自由、广阔的新天地；而梅女士自己则不折不扣地跌进了“柳条的牢笼”，而且几乎陷于难以脱身的境地。现实的教训不得不使她整饬自己的思想，去作更坚苦的斗争。在泸州期间，她变得成熟一些了，不管多么新奇的名词也不敢轻易相信，但是“单独在人海中闯”的孤寂感仍表现出尚未选准思想归宿的难以排解的苦闷。只有到上海以后，感受到了集体主义的伟力，在革命者梁刚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下，特别是经受了五卅运动的考验，她才成长为一个无畏的战士。梅女士的成长历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求索真理的过程。

“五四”以后的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大体上也是这样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虹》描写“五四”时代精神在促成“人心”的“刻刻转变”，而且又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转变，也是作者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一代人的精神面貌的本质反映。自然，作为“一代”来表现，梅女士的思想演变是不算完整的。这部小说原定计划就是要为从“五四”到大革命的“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①，因故没有完成，只写到“五卅”。然而作为“壮剧”来看，从“五四”到“五卅”，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小说正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律动。

五四运动是从思想文化领域里发端的，“知识分子是首先

^① 茅盾：《虹·跋》，《虹》，开明书店1930年版。

觉悟的成分”^①。茅盾用文学去反映这一段历史，率先从联系着革命的知识阶层入手，无疑是把握了历史的本质，表明了作家站在历史的高坡上去观察时代的精确性。但作为一代社会历史的总体面貌来概括，仅此还是很不够的。茅盾所追求的目标是反映“全般的社会机构”^②，《虹》描写了都市的生活，那么都市以外的乡村、小城镇呢？知识阶层以外的其他社会阶层呢？他的另一部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就补充了这样的内容，使得这一段“编年史”表现出相当的完整性。

《霜叶红似二月花》也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只要看作者原来的意图——“打算写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③，就可想象出这是一部历史性巨著。小说没有写完，留给人们的是“五四”以后的一段社会历史情状，恰恰同《虹》相映衬，丰富了这段历史的纪实。小说所展现的生活图画就是来自茅盾作品所常见的江南水乡城镇。人们从中看到了20年代农民的贫困和愚昧，土财主的欺诈和横行，以及小县城里的守旧势力、土豪劣绅、破落的世家子弟、无力回天的“新派”人物等形形色色的嘴脸。斑斓的色彩，勾画了一个时代的轮廓；而富有地方特色的风俗画，则活现了江南社会的风情、世态。有人称这部作品具有“《红楼》风韵”，恐怕正是就它对社会世相的透骨剔肌的刻画而言的。但是，如果从反映社会历史的本质着眼，小说的重要价值还在于描写了同《虹》截然不同的“五四”以后的另一个侧面，从而表现了社会的“全般”性。

①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523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②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③ 《〈霜叶红似二月花〉新版后记》，《茅盾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从小说所展现的画面看，这里的确已经稍稍透露出新时代的气息：乡村的河道上已有轮船行驶，城里人对出洋留学已奉为时尚，“声光化电”也是乐于谈及的新名词……不过，总体上仍掩盖不住旧时代所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单从陈独秀的名字被叫成“陈毒蝎”，这半是无知、半是嘲骂的声调，就折射出僻远乡镇对“五四”声浪的隔膜。因此，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仍旧贯必然构成社会的基本色调。在这里，主宰一县命脉的依然是腐朽的封建势力、遗老遗少。那个霸占着全县“公益事业”大权的头面人物赵守义，就是地主兼高利贷者。他把“善堂”视为私产，对乡民无恶不作，生活上又腐朽不堪。他同轮船公司的总经理王伯申的矛盾冲突构成全书的情节主线，在不肯动用公款修建河道，因轮船的行驶使农田受淹的争斗中，他的蛮横无理表现出封建势力的猖獗。他最后同王伯申握手言和，蒙受损失的还是赴告无门的农民，显出了当时社会中最黑暗的一幕。小说还描写了企图有所作为的“新派”人物钱良材，为乡民的利益在县府与头面人物之间竭力斡旋，但始终无济于事。故事就在他的斡旋失败以后的悲叹声中收束，既表现了这类人物的无能为力，也使整个作品笼罩了一层浓重的悲剧气氛。像这样的历史画面，显然同《虹》所描写的壮阔的革命声势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对同一时代里的这种不同现象的描述，正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入解剖。五四运动固然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①，它的影响力在乡镇就难免表现得极为微弱了。而且，光靠一次运动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古老中国社会的根基，“五四”落潮以后社会仍陷于愚昧和黑暗之中，这也是无法漠视的事实。即此一点而言，《霜叶红似二月花》所展现的历史画面也反映了历史的真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60页。

实，也唯有在《虹》正面反映“五四”浪潮的同时，再从另外的角度去描述当时的社会情状，方见得对这段历史的纪实是全面的、完整的。

把这两部作品联贯起来思考，人们不难看到，茅盾注目于“五四”以后七、八年间的中国社会，力图反映它的“全般”状况，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一幕留下了珍贵的艺术记录。这的确是极重要的一笔，因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变动是从这里开始的，其后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也在这里隐伏了基因。小说真实描写当时的社会情状，既是对这一段历史的艺术再现，也预示着未来社会的发展动向。梅女士一类青年刚刚踏上革命征程，还需要经受更严峻的考验；“暗陬乡村”的生活描写，则表明社会应当有一个更大的变动。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类作品事实上已在呼唤另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到来了。

二 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性探索

是的，这样的时代是很快就到来的。1927年前后，在全国广袤的土地上爆发了“震动全世界、全中国的几次大事件”，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史上作为重要一页来记载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从掀起到失败的“历史的事件”。^①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当然是由《虹》和《霜叶红似二月花》所展示的需要变动的社会历史图景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而它的壮阔声势以及使革命在一夜之间倒在血泊中的沉痛教训，又远非“五四”一幕所能比拟。这是一出伟大的悲壮剧，既往的历史未有表现得如此深刻而严峻的；这是历史进入又一个时代的表征，时代呈现出更纷繁的色彩。茅盾用中、长篇小说写出现代中国社会的“编年史”，自然不会放过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记述，而他对

^① 茅盾：《我的回顾》，《茅盾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版。